



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周年。丝绸之路是经济交流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它让异域珍品纷至沓来,也使中国瑰宝走向世界。

欧亚大陆间延续千百年的交流往来,留下许许多多文明的印记。这些文明交流的印记该怎样解读?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距今5000多年的马家窑彩陶风格,竟与黑海地区、南亚次大陆上的彩陶“撞衫”。这是历史选择还是偶然巧合?

笔者从古之长安、今日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一路向西,到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在行走中寻找答案,体验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走进博物馆,与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迹、文物古迹“相遇”,一览文化与思想、科技与艺术交融碰撞出的绚烂火花,憧憬这条千年友好合作之路续写世界文明交流新图景。

文明往来之史见证文明融合之美

从长安出发:寻找丝绸之路的“引子”

考古学家、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已经在古丝绸之路上游迹文化遗存20余年。

作为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从2000年开始,王建新带领学术团队,从西安出发,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沿线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文献考证,逐渐发现了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特征和分布规律,并初步确认新疆东天山的美丽草原是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

“大月氏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缘起的‘引子’,”王建新告诉笔者,“但是长期以来,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对古代月氏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

2200多年前,原本居住在中国新疆东部的游牧民族——大月氏人受到匈奴人的打击后,踏上漫漫迁徙之路。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支——大月氏沿着天山一路向西,最终在中亚阿姆河北岸、西天山西段建立新的家园。公元前139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寻找大月氏。

2100多年前“寻找大月氏”促成的凿空之旅,开辟了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穿越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度交流。

如今,为进一步印证新疆东天山沿线的文化遗存属于历史记载中的大月氏人,必须找到西迁之后大月氏人的考古遗存。从2009年开始,中国考古学家陆续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考古学家合作,在西天山地区开展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联合考古的成果让人惊喜不断:在西天山地区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聚落遗址;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建立了《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出土了大量铁制兵器、陶器、珠宝等。

2023年,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实现了在中亚五国考古工作的全覆盖,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巴拉特遗址开展了补充发掘,发掘出古代月氏人的墓葬42座,为进一步研究古代月氏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近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正与撒马尔罕考古研究所合作,对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苏尔汉河东岸新发现的契纳尔特佩遗址进行发掘,有望为研究贵霜文化提供新的资料,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在接连出土的文物遗存中看到了多处“相似”,成为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标记。在库勒特佩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马蹄形带扣,其外形与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铜鎏金神马纹带扣酷似;在考克特佩出土的四乳四瓣雕与长安汉镜形制纹饰雷同,近乎同范;在阿克塔姆发现的明连弧纹带扣也与长安汉镜几乎相同……

王建新说:“这些文物既有突出的草原特色,又有鲜明的中原风格。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创造了延续至今的辉煌历史。”



中国南宋凤首长颈瓶。

甘肃马家窑:5000多年前的“撞衫”

丝绸之路的故事,远在“丝绸之路”之前。张骞只是有史可据的“凿空”西域第一人。在张骞之前,丝绸之路之上就已经有了许多先行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证实,这一连接欧亚大陆的陆上通路,在汉代之前,就留下了诸多文明交流的印记。

将时间指针拨回到1000年前。

1924年,刚刚完成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在这里,他对史前人类遗址进行考察,并命名为“甘肃仰韶文化”。安特生在马家窑发现了中国彩陶与中亚和黑海西岸彩陶的相似性。

彩陶,是马家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博物馆,笔者看到,亮如漆的黑彩、红彩、白彩,绘制在橙黄色的陶底上,形成灵动的水波纹、漩涡纹、网格纹。罐、壶、盆等丰富的器形和光滑细腻的外表,让马家窑彩陶更多了几分优雅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长期研究马家窑文化,曾赴数千公里之外的罗马尼亚、乌克兰一带开展工作。他发现,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彩陶的大繁荣。这种相似,被近年来考古研究工作不断印证。

李新伟说:“令人称奇的是,两地彩陶在纹饰和器型上都高度相似,风格相近,它们常运用弧线三角和平行斜线的组合,也都做陶塑人头像。”

李新伟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后来走上不同的发展历程,但在5000多年前,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相距数千公里,却几乎同时兴起、同时衰落,相似的彩陶文化背后,是相似的史前农耕文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马家窑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家窑文化经新疆传至中亚,源自中国的粟、黍也随之向西传播。中亚的锯齿纹等纹饰出现在马家窑彩陶上,来自西方的绵羊、黄牛最早也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区域中出现的。他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5000年不中断,除了自身有强大传统外,还在于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交往融合。”

新疆阿勒泰:黍麦在这里相逢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八国接壤。“丝绸之路”使新疆成为多种文明交流融汇之地。新疆各地发现的彩陶、铜镜、海贝、玻璃珠饰、凤鸟纹刺绣等文物已清晰地昭示,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存在经由新疆天山廊道和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亚欧草原的通道;殊方异域的各类奢华珍奇和冶金、农业、畜牧技术及物品,通过这条绵延不绝的通道交流传播。

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奔腾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传播的重要枢纽,也是东西方粮食作物传播的通道。

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笔者看到通天洞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产自约5200年前的碳化麦粒。这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麦粒遗存,在同一个遗址,还发现新疆境内最早的碳化黍粒遗存。

黍,又叫糜子,去皮叫黄米,是商代的重要农作物,最早在我国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种植。

麦,是今天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它不是本地植物,数千年前从中、西亚传入我国,商代很少见。

这两种地理位置相距甚远,在古代看似难有交集的粮食作物,却在5200年前相聚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通过对该地区阿依托汗一号墓人骨进行碳氮分析,推测麦、粟、黍可能已经是当时人们的食物来源。

“5000多年前,源自西方的小麦和源自中国的粟、黍以阿勒泰为中转站,一个东传,一个西进,为生存和繁衍提供物种资源,造福东西方人民。”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研究员卓娅·巴合提说。

在经济、政治的密切往来中,东西方文化在新疆交流荟萃,形成文化百花园。

在吐鲁番博物馆,一幅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墓地的伏羲女娲像绢画格外引人注目,绢画上的女娲深目高鼻,伏羲络腮卷须,他们身着对襟的胡人服装,俨然是少数民族形象。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爱峰说:“在吐鲁番出土的众多《伏羲女娲图》中,除了有少数民族形象,也有传统汉人形象的伏羲女娲,生动反映了当年吐鲁番盆地各民族杂居、交融的情景。”



中国明朝月型青花瓷瓶。

联合特展:欧亚大陆的“翻译”

欧亚大陆间延续千百年的交流往来,留下许许多多文明的印记。这些印记该怎样解读,又应该由谁来“翻译”?从意大利都灵今年新开设的联合特展“欧亚大陆的‘翻译’”中,可以找到答案。

展览在意大利都灵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这座博物馆也是意大利以及欧洲最重要的东方艺术博物馆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藏品时间范围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平均每年接待访客超过10万人次。

“展览中展出的文物正是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策展人劳拉·韦格说,“通过展出一系列不同历史时间段、不同国家的文物,展现材料、图案、造型等文化艺术元素是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传播的。”

劳拉·韦格最“偏爱”的展品是一组蒙古金织锦风格的织品碎片,它们来自13世纪中亚地区。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曾经被用作地毯、窗帘等的织物上,可以识别出中国古代经典神兽麒麟和龙的造型。

劳拉·韦格评论称:“织锦上的麒麟图案说明,中国元朝流传来的纺织品受到西方各阶层珍视。虽然相距遥远,但欧洲和亚洲都属于欧亚大陆这一个整体,文明之间的联结十分紧密,商贸、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密切。”

在这个展览上,还有两件展品相映成趣、互为“解读”。一件是明代月型青花瓷瓶,产于中国的景德镇,瓶上的几何形装饰布局八角星形图案,则与西亚和中亚地区使用的器物具有相似性。研究者认为,这是当时中国陶艺家顺应西方买家的需求和口味,对中国青花瓷进行了融合创新。

另一件是意大利画家乔凡娜·加佐尼的青花瓷静物画,画作中精美的青花瓷瓶,不仅是中国瓷器和艺术在欧亚大陆流通的明证,也再现了15世纪以来欧洲宫廷对东方情调的热爱。

中国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使者”。在意大利罗马的文明博物馆,珍藏着一款中国南宋凤首长颈瓶,这件珍品肚圆长颈,瓶口外翻,饰以凤头。据博物馆介绍,其“凤头”像是一种凤凰与仙鹤的结合体,而仙鹤是波斯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这是东西之间商品和文化密切交流的证明。

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又称老皇宫),珍藏着许多沿古丝绸之路而来的中国瓷器。

老皇宫博物馆馆长伊尔汗·科贾曼告诉笔者,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帝国国史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博物馆藏有1.2万件中国瓷器,属于中国元、明两代的青花就有1354件。目前展出的约400件藏品多是苏丹及皇室成员的御用品,以及招待外国使节时使用的餐具。

近年来,中土两国文化及文物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陕西各博物馆的文物精品就曾组团到托普卡帕宫展出。科贾曼向笔者透露,可以展示近3000件古代瓷器精品的新瓷器馆正在建设中,有望在年内开放。

更多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正不断推进,王建新介绍,今年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将与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蒙古国、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发掘文明往来之史,见证文明融合之美,启迪文明发展之路。

□杨一苗 张玉洁 张瑜 张馨文 王强 王峰



大彬款圆腰式提梁紫砂壶。延安博物馆藏

明代大彬款紫砂壶映照的工匠精神与历史文化

新建成的延安博物馆内,展出的明代“大彬款”紫砂壶,以其精湛工艺诉说着明代的工匠精神,更作为黄土高原上军功士族荣耀的象征,展示着它的历史文化。

吟竹浩然

延安博物馆基本陈列的明代展区,在独立展柜中一件“明代大彬款紫砂壶”前,观众或低声讨论,或凝神细赏,仿佛透过这把壶窥见那个风雅的时代。

该壶为紫褐色,胎泥细腻,通体椭圆造型。盖子与壶身合缝严实,盖面呈弧形,扁圆形盖钮。肩部置高提梁,提梁轮廓外圆内平。壶的外壁有类似茶锈黑色的斑迹,整体风格古朴典雅精巧,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优等生”气质。

该壶珍贵之处在于腹部7字款竖行阴刻铭文“吟竹养浩然 大彬”,刻款刀法遒劲,笔流畅。其中,“大彬”二字引起了当年参与考古发掘人员的注意。这难道是明代那位著名制壶大师的作品?据历史文献记载,时大彬的紫砂壶因其精湛的工艺而备受推崇,市场上“一壶难求”。

《陶庵梦忆》中张岱惊叹其价格昂贵,而《杂说》里李渔对此高价表示惊讶。《阳羡茗壶系》亦记载,名手所制的紫砂壶价值连城,而陈维崧在《湖海楼诗集》中提及市场上充斥劣质品,真品极为稀缺。这些描述不仅突显了紫砂壶的珍贵,也反映了鉴别真伪的必要性。

在明清之际都如此珍贵的大彬壶,怎么会出现在塞外陕北?

据悉,自署款识,是大彬壶的显著艺术特色之一。这种以竹代笔,在壶作品上署名的方式,使得这种书法深得明代文人雅士的赞赏,也成为辨别作品真伪的重要标准。专家通过对壶上铭文的细致分析,结合紫砂工艺特点,以及在全国各大博物馆中保存的大彬款紫砂壶进行对比,最终确认该壶的铭款风格一致,从而验证其真实性。

该壶身上的“吟竹”即歌颂竹子的品格,“养浩然”源自《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指的是一种宏大、刚健、正直的气质或精神。铭文中的这些字,也可以看作该壶的制作者对工艺和生活哲学的体现。

“吟竹养浩然”铭,既是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文化传承的尊重。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紫砂壶的制作上,也体现在所有手工艺领域中,是对传统工艺的一种尊重和传承。那么这个制壶大师,有什么故事呢?

工匠精神

壶上提到的“大彬”即时大彬,为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的著名紫砂艺人,他的父亲时朋与董翰、赵良、元畅并称为紫砂壶制作“四大家”。时大彬继承父业,又有所创新,将紫砂壶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度。“大彬”壶,不仅在技艺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更在艺术上展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

据历代研究大彬壶的专家发现,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古朴雅致,善于模仿供奉大壶,后受文人影响,制壶风格由大转小,且对作品质量要求极高,不满意的作品会毁弃。

时大彬对紫砂壶工艺的极致追求和对完美的不懈坚持,是造就他的作品在明代就已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

大彬壶明代就少,传世的更少,至清乾隆年间已被视为稀世珍宝。现存作品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宜兴时大彬制紫砂壶”和“时大彬”款紫砂胎红山水人物图执壶,南京博物院藏“大彬款提梁壶”等数量极少保存在博物馆中的作品。而延安出土的这件紫砂壶其价值不言而喻。

据紫砂壶研究专家表示,紫砂壶的制作涉及材料学、热力学等多个领域,尤其宜兴紫砂壶以其洗练别致的造型、刚劲流畅的线条、恰当的比例、醇厚古雅的色彩和严谨的制作技艺成为陶瓷艺术的瑰宝,而大彬壶则是宜兴紫砂壶中的精品。

大彬壶的艺术特点是确立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高难度技术体系,包括用泥片和镶接的凭空成型技术,甚至对后世紫砂壶的制作产生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艺人们将文学、金石、书法、绘画、篆刻等形式融入紫砂壶制作中,提升了其艺术价值。

延安出土的这把壶的珍贵不仅在于其工艺,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军功士族

自古陕北为“塞上烽烟 胡汉交融”之地,在明代以前就有夏州拓跋(李)氏、府州折家、麟州杨家等在历史上守疆卫国、精忠报国。考古学家发现,这件紫砂壶的主人所在的家族,同样身世不凡。

资料显示,该壶1987年出土于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村明代杨如桂墓中。那么,这个杨如桂又是谁呢?

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杨如桂的生平事迹。杨如桂字德馨,号苏庭,曾在陕西华亭、凤翔任职,并担任过山西陵川县知县,解任后回到延安。杨如桂墓志记录他“士族清流杨如桂,长子廷亮,娶指挥使张诏之女为妻;次子秀才廷豪,娶县学秀才李赋奇之女为妻;幼子廷翔,府学庠生,娶郾城知县高梦祚之女为妻。女儿则出嫁赵彦胞弟赵章幼子廷妻(亦作廷胤)。”可以看出,其家族通过与其他显赫家族的联姻,巩固了在地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据洛川民俗博物馆馆长段双印研究员多年对“明代延安的世家望族”研究发现,杨氏家族是其中以军功起家的代表,他们在保卫国家边疆、推动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杨氏家族成员在边防上的贡献尤为显著,他们多次参与守边战斗,保卫了明代的边疆安全。 □卜丁



张骞雕像。



丝绸之路示意图。